

· 读写札记 ·

##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 后叙暨《孔子评传》书后

蒋广学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93)

2012 年 4 月 24 日下午, 当我校完了本书最后一篇《读〈孙中山评传〉》的校样之后, 我的心情并未像以前所想象的那样轻松。那些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作过不同的贡献但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学人们, 一个个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1 对《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教授和已逝作者的怀念

第一个耸立在我面前的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主编, 长期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的匡亚明教授。1990 年 5 月, 我的人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蒙他老人家不弃, 把我安排在自己的门下做《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书稿的“拾遗补缺”工作。那时他已经是八十五岁的老人, 许多人不理解他为何在这风烛残年还要下这样一盘自己注定下不完的险棋, 而他低吟《诗·王风·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的诗句, 期待我与他、与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同仁一道共镶这空前宏伟的工程: 以 200 卷、6000 万言的巨大篇幅完成毛泽东提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予总结, 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历史性任务。

匡老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是在顽强地与严重疾病作斗争、与超负荷的工作任务相磨挫的状态中渡过的, 我们这些在他周围的人, 无时无刻不担心那一刻的到来, 1996 年 12 月 16 日在突然间来到了。在无比的悲痛中我写下的这首诗“青松无声夜染霜, 意随寒风游八方。君将愁心与明月, 九州此时是一乡。”表达了作者、编者、审稿者和出版者的共同决心: 一定不会辜负匡老的期望。2006 年 9 月, 在纪念匡老百年华诞之时, 200 卷“评传”按预定计划整体出版, 老人家的英灵大概是可以安息了吧。

仅我个人所知, 在组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的二十年间,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作者就有多位不幸逝世。给我留下难以磨灭印象的, 有《庄子评传》的原作者卢育三, 《二程评传》的原作者冯憬远, 《汉武帝评传》的作者庄春波, 《潘季驯评传》的作者贾征, 以及《王念孙王引之评传》的作者薛正兴等。

卢先生和冯先生与所写传主厮磨有年, 均有相应的论著问世, 无奈承接“评传”的写作任务后便患上了重病, 而在我到天津和郑州访问他们的时候, 两先生的目光中充满着期待: 他们既爱恋与之朝夕相磨的传主, 同时更想将自己大半生的心血流入无尽的事业之中, 希望我们能再给他们一点时间。这让我想起了近年来病逝的萧薰父先生。

萧先生是我国最为著名的研究王夫之的专家, 很早认领了撰写《王夫之评传》的任务。然而, 多年来他一直饱受严重的哮喘病的折磨, 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领导同志和我本人曾多次到府上拜访, 我也暗示他尽快退写, 但他始终不松这个口, 后来终于同亲炙弟子许苏民教授一起了却了自己的心愿。然而, 他觉得该书仍然存有一点遗憾, 即“稀有与传主王夫之及其亲友们的影子怡然相对的悲喜同怀与心灵相通”。所以, 在其弁言中, 将半个世纪以来每读船山遗书、每访湘西风情旧物而即兴所赋的大量诗作中选出十首展于全书之前, 以醒读者之目。其中两首曰“当年瓮牖秉孤灯, 笔隐惊雷俟解人。三百年人神不死, 船山应共颂芳春。”“盘藕修罗梦未圆, 无穷悲愿堕情天。屈吟贾哭俱陈迹, 唤取猖狂共着鞭。”我想, 像萧先生这样, 在其爱徒的帮助下终于完成了五十万言的鸿篇巨制仍深怀稀有与传主心灵相通之遗憾, 卢育三先生和冯憬远先生天大的遗憾, 则随着生命的悄然离去而不能倾诉, 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啊!

让我无限悲哀的还有庄春波和贾征两位青年副教授,以及新近离世的薛正兴教授。贾征是明代水利工程学家潘季驯“评传”的作者。在我华中师范大学招待所里见到他时,一个胖墩墩、圆实实的青年与我面对面地侃侃而谈,没想到在《潘季驯评传》出版不久便因患癌症而去世了。庄春波走得更突然。《汉武帝评传》前后修改了数遍,在他写信通报稿件已经改定之后,突发脑溢血经多日的抢救无效而离去。薛正兴教授虽然是在《王念孙王引之评传》出版后而过世的,但他在承接这本书的写作任务时,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他突发脑溢血逝世,显然与撰写60万字的书稿有相当大的关系。

作为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常务副主编,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作者做“讨债式”的催稿。因而,每想到他们的不幸,我总有一种负罪感,于是常常反问自己:如果不是像债主那样逼迫他们,他们会不会就这样的不幸。然而,让我宽慰的是:没有一位的家属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庄春波的夫人刘春明女士在她为《汉武帝评传》所写后记中说道“史学之于春波是生命的重要部分。我曾笑他是为了‘秦皇汉武们’活着。”“春波为著《汉武帝评传》,几年来呕心沥血,废寝忘食。2001年6月底,书稿已经杀青,仅有些微技术性工作需要再处理。就在我们怀着喜悦等待胜利的时候,他突然倒下了。”在送走春波的第二天,她流着眼泪开始为春波的遗作《汉武帝评传》核对原文,最终完成了出版社要求的“齐、清、定”稿。在那篇后记的末了她提到“几年来,蒋广学先生以及审稿人王文清先生给了春波多方面的指导与帮助,春波一直是铭记在心的。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是的,凡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而逝去的同志其生命都是与这套丛书联为一体的。而众多现在仍然健在、多年来将自己的宝贵年华付诸这套丛书的作者,何尝又不是如此。我毫不夸张地说:200部书稿,有200个生动和感人的故事等待我来述说。如果将来我的精力还好,我会将它们写出来,让后人看一下,活跃在20与21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界的“国学”研究者的精神风貌。这正是“雕鹰夜战到黎明,杜鹃吐血征人行。秋阳高照雁南飞,朔风呼啸邀鲲鹏。”

2 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的心路历程

二十年来我所做的,则是在丛书众多作者治学精神的感召下,对其书稿的学术思想的内容进行概括和评价。匡老在他逝世前的一个月(1996年10月),曾以“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传,写好中国思想家评传”为题,向南京地区的作者提出过殷切的希望。时过十多年,他的原话我已经记不准确了,但大体意思是: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特别是从孔子以来,秉承立德、立功、立言的古训,每一时代都有一批知识分子,在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创造出那一时代的特殊思想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大家要有这样一个自觉,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承继这份宝贵的遗产,创造新的精神财富,照耀当代,遗教后人。这是一项十分光荣的任务,你们的工作一定会载入史册。

所有的评传作者,其探求历史真相的劳动都是十分艰辛的,但他们原创性的成果都受到了保护和尊重,这比起“文革”以前的学术界又是极为庆幸的。而我作为一位每部评传的“拾遗补缺”者,虽然比每位作者更加辛劳,但是,比起大家,我却多了一份庆幸。每部评传的作者,他们研究的是历史上的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物,心心相照,写出了那一段的光辉篇章。而我则在他们劳动的基础上,以及在审稿人、分管副主编的启发和主编、终审组老师的帮助下,将一颗颗的心串联起来,上溯唐尧,下联康、梁、孙、章,形成一条认识我们民族思想发展的金光大道,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

一开始我就怀有这样的自觉、这样的情怀,所以在阅读书稿时努力寻找两颗心:传主的心和作者的心。只有找到这两颗心,全书的内在结构才能显现出来,思想意义才能明亮起来,以此为基础来“拾遗补缺”,发表的意见才能真正有补于作者。由于来思想家研究中心之前我并未系统地学习过传统文化,寻找“两心”的工作十分艰难。这反而刺激了我认真读稿的自觉。慢慢地,我竟把每部书稿当作意中人来迎接:朝也斯、暮也斯、醒也斯、梦也斯,岁岁年年不离斯,与每部书稿页页相切相磋,形成了不少文字,这便为我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形成了扎实的基础。

真的,本书是我晚年朝夕相伴的“梦中情人”,她与我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儿女情长,但我本人在通过历史探求祖国未来发展道路时所流出的辛勤汗水,却是由她来为之冲洗;本人在探求真理所缺乏的智慧,也是由她来开导。她使我晚年的生命充满了

活力,享受着笔耕者的乐趣。所以,在我初写的后叙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此情只配天上住,强落人间有几数?仙子怜我老夫心,伴我朝朝又暮暮。”今天,我仍将它一字不改地插入后叙新稿,展现我二十年来的精神生活。

最后,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我同传主、作者思想神交与冥合的写照——每篇札记的“神会庐主曰”,其文或长或短,均是我灵府之节动,愿借匡老神灵之荫助,让它如山涧流水,不因天塌而断流,不因地陷而干涸。不错,这本书不可能将作者、审稿者和编辑者的心血收集殆尽,但 200 卷“评传丛书”在,故而心血点点收不尽,无废江河千古流。我含老泪为之祷矣。

当然,这部书不是在梦中写成的。我要感谢几十年来支持我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工作的妻子、孩子和其他亲属。人入花甲,各种疾病接踵而来,没有他们的支持和佑护,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是不可想象的。我还要感谢对本书有直接贡献的陈晓宁先生、李昱博士、责任编辑。

### 3 “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评传》书后

孔子(公元前 551 ~ 前 479 年),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尼山)人,祖上为宋国贵族,其六世祖孔父嘉参与“宫廷政变”被杀后,五世祖木金父东逃至鲁,后数代不见史书,直至乃父叔梁纥两立战功,“以勇力闻于诸侯”,方进身陬邑大夫,至花甲之年,生有九女和一残疾子,无奈,便在六十六岁时与不满二十岁的颜征在“野合”,鲁襄公二十二年“祷于尼山”时生下一男,故名丘字仲尼,后世不敬者,直称“孔老二”。

本书特别强调了丘在三岁逝父、由母带到曲阜阙里抚养之后的贫贱生活,“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帮人放养牛羊,乃至充当乡里红白喜事的吹鼓手,在参加鲁国贵族季平子为“士”而设的家宴时,居然被家臣阳虎拦在门外,真是狗眼看人低了。丘十五志于学,开始研习六艺,从此“学而不厌”;鲁昭公十年(前 532 年)二十岁后,出任看管仓库和牛羊畜牧的小吏“三十而立”,大体上“确立了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即内容与形式相结合而又以‘仁’为主导的反映了突出尊卑贵贱等级的封建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整套伦理观、政治观和社会观”(P36,此为《孔子评传》的页数,下同)同时形成

了“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的人生哲学。约于此时,收颜由(颜回之父)、曾点、子路、颜回、冉雍、冉求等为徒,设坛讲学。

鲁定公九年(前 501 年),孔子五十一岁时任中都宰,次年出任大司寇,又“摄相事”。此时的鲁国,“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权可抵国的季氏家族,竟由家臣阳虎“专鲁之政”,故实行强公室、抑大夫、贬家臣之策。在“堕三桓”失败后,率徒周游列国,继续宣传其政治主张,颠沛流离十四年,鲁哀公十一年(前 484 年)六十八岁时无功而返。然“不知老之将至”,继续聚徒授业。一生“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又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释《易》,集前两千余年之大成,启后两千余年之伟业。哀公十四年(前 481 年)七十一岁时,西郊打猎而获麟,预感末日将近,哀叹“吾道穷矣”;又遭得意门生四十一岁的颜回病故之击,悲痛至极,失声痛哭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鲁哀公十六年,卧病七日而歿,享年七十三岁。

本书之末,特引用司马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后的一段话,突出中华学术成于“布衣”之意“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评价孔子,首先涉及到自然是政治问题。历朝历代均是如此。本书作者匡亚明(1906—1996 年),自幼喜读《诗》《书》,1924 年后发表多篇论孔孟文章,宣传孔子的思想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相似性;1926 年参加革命后开始将孔子作为封建主义的总代表而走上否定孔子之路;后在恽代英的影响下,认识到“一旦进入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时仁就会射出更加灿烂的哲理思想的光辉”,于是又重新肯定了孔子(P491),且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自励,囚于铁窗图圉不改志,战于枪林弹雨仍从容;1942 年至延安,曾与毛泽东主席一起论孔,主席希望他在举国安定后,“来总结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对孔夫子的批判继承和评价问题”。(P492)此后数十载,目睹全盘否定孔子之新害,实不小于两千余年奉孔子为至圣先师之余毒,便于 1981 年辞去南京大学校长职务后,在洪家义、阎韬、贾平年、方延明、石连同等人的帮助下,完

成了齐鲁书社版的《孔子评传》的写作;而本书,则是在齐鲁版基础上,呕心沥血,孤灯独照,进一步损益而成。

在本书中,匡老不仅要回答“布衣孔子”为何能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伟大奠基者,更重要的,是要分析这位哲人究竟在哪些方面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赖以繁衍和发展的基础。

本书先将孔子生活的时代定位为封建领主制的社会,而不是郭沫若“西周奴隶制”说,尽管如此,社会仍处于大变动的前夜,“礼崩乐坏”的形势需要一代哲人为其指明变革的方向;而就其“意识形态”而言,西周时期,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已经从人类的进化中看到“天命靡常”,春秋时产生了“天道远而人道迩”的意识,认识到“‘天命’是通过民意表现出来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且人民所求,‘天命’必从(‘民之所欲,天必从之’)。”(P111)从而产生了“以德配天”、“保民”、“裕民”的民本主义思想。而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在整理六艺的过程中,“不语怪力乱神”,即以悬置“天命”的办法,将对神秘天意的“追问”转换对人与人关系的研究,从而创建出后来被匡老称之为“人学”的思想体系。

这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就是“仁”,出发点就是“爱人”,当然,爱有等差,而非墨子平等无差的“兼爱”,但有了爱人之心,就可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人学”中没有“彼岸世界”,它首要的任务就是教人在现实的生活中怎样做人:在家讲孝悌,出门讲忠信、泛爱众,对人要恭敬,做人要智勇,下至百姓,上自天子,当然首先是王公大人,要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实现大同理想。而作为第一步,要宪章文武,忠君尊王、齐之以礼,举贤才,庶民,富民,教民,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而,较为完整地说,匡老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乃是以悬置天命、崇尚民本为前提,以等差爱人为基本出发点,以仁为核心与以礼为形式,两者结合,并且通过庶、富、教民,逐步由忠君尊王的礼乐小康社会,而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社会。

现在看,匡老对于孔子思想的论述似乎没有惊人之语。然而,如果联系20世纪80年代我国思想界、学术界的特殊背景,便可强烈地感受到,本书对于孔子研究以及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历

史意义。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他克服了机械的“二分法”,而明确提出“三分法”:“一、对其封建性糟粕进行批判和清除;二、对其人民性精华进行继承和发扬;三、对其封建性和人民性相混杂的部分进行批判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即扬弃。”(P9)而在解释批判封建性的糟粕时,匡老这样说:诸如“忠君尊王”这一类,曾是封建社会中长期统治人民束缚人民思想的“三纲五常”的基础,这当然要批判,但是,“和它们决裂,并不意味着否定它们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合理性。这些观念对于建立当时历史条件下等级制阶级社会政治和生产的正常秩序、维护国家的统一,都起过某种历史作用”(P9/P388)。此论对于其后逐步兴起的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运动起了先锋作用。

其二,用“仁为核心礼为形式的仁礼观”来概括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内容,对于全面把握孔子的思想具有历史性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政治史、思想史和学术史,尊孔派和反孔派最大的分歧点就在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认识上:尊孔派认为孔学的核心是“仁”,而反对派则异口同声地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匡老的这一观点,用意不是要调和两派的矛盾,而是还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匡老指出“礼是宗法等级社会的制度、规范,它强调的是尊卑长幼之序,是具有不同名分的人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仁按其本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思想,强调人们之间的仁爱、谅解、关怀、容忍,也强调广大人民物质生活的安定和提高(安、信、怀和庶、富、教)等等。从社会政治方面看,如果只有礼而没有仁,那就会加深对立,导致矛盾激化,造成社会危机。如果只有仁而没有礼,就会产生没有差等的仁爱,以致模糊上下尊卑的界限。这两极都是孔子所不希望出现的,于是他用中庸的办法,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使仁和礼相互制约,相互辅佐,从而达到一种有等级但不过分对立,有仁爱但不无区别,亦即等级与仁爱对立与和谐的统一,和大家生活安定富裕的理想状态。”(P195)匡老认为:只有实事求是地看到这两面,才是“发现”了一个真实的孔子。

其三,匡老认为,孔子乃是以教育为手段来推动社会改革的思想家。所谓教育,就是传承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教人有做人的自觉,故而以其整理过的六艺定本为教材,“有教无类”,广收学生。

孔子坚信,人性是可以改变的,所谓“性相近,习相远”;教育家的责任,就是通过对学生的全面而系统的教育实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目标。本书引用《礼记·经解》中孔子的话,解析其教学内容“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匡老说“这说明了‘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并表明了寓德育于智育之中的作用。”(P304)作者说此话时,凝结了一位教育家本人的终生经验,而对数十年的空头教育,不啻为当头棒喝。本书还讲到孔子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在分析《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意义时,则用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为开其意。发,为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而知其三。反者,还一相证之义。复,再告也。”对于何为启发式教学,给予了全面的阐释。书中特别提到“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让学生对孔子崇敬不已。子贡曾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P320 引)教育家之孔子,其业绩如日月也。

神会庐主人曰:我到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任职时,本书已经发稿。读者可知:当年,我在初读匡老新书时,与现在的心情竟有天壤之别。那时,我时时为有无高拔孔子而担心;而今日,每读到批判封建主义的字句,倒有些“触目”了!噫兮,何其怪哉,何其怪哉?

不过,在强烈的反差之下,对于匡老在耄耋之年亲赴西双版纳边远山区,考察当地祖传遗迹,佐证西周社会性质为“封建领主制”的做法有了新的认识:考定了西周及孔子所处时代的性质,是确定孔子学说性质和历史地位的基础。匡老说“分封制、宗法制、等级制相互渗透,三位一体,形成了西周封建社

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它不仅是西周而且是尔后长达三千年中国封建社会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决不应忽视的重要特征。”(P110)以此为基础来认识孔子,尽管他对当时为何会产生礼崩乐坏政治局面的客观规律缺乏认识,但他绝不是“复辟狂”,亦不可一味地用“保守派”来名之。他是一位不满现实和立志改革现实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孔子教“士”、教从政的“君子”怎样做一个人,其论述有着不朽价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己立则立人,己达则达人”、“己所不欲忽施于人”、“朝闻道,夕死可矣”,等等,等等,片言只语,则可启人圣心,不以时迁,不因入异,无视此言,岂有丽天红日?当然,话也要说回来:对于一个客观上必须改造的政治制度,主要地依靠教育、改造“仕”者的“人心”是远远不够的。这恰恰是孔子学说的局限所在。当时之中国和之后之中国,都需要新的思想家来提供新的学说。

匡老重视孔子,又不以孔子为“至尊”。他有更为高远的政治理想,更为深邃的理论思考。这就是他于八十岁之后为何主编 200 卷《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原因所在。他希望通过研究百家之学来启迪后人。我来思想家研究中心时,匡老不断地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启我心志,在学风日益功利化,有形无意地驱赶着人们追名逐利之今日,岂敢忘哉!

#### 参 考 文 献

- (1) 匡亚明. 孔子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版
- (2) 蒋广学. 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12 月版  
(作者简介) 蒋广学,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